责编/伍施施 校对/刘 萍 版式/陆 虹 衡陽日報

夏商周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时期，拥有青铜器、甲骨文等灿烂的文化瑰宝。近日，专栏作家、留日学者刘洁做客国学讲座，深入阐述夏商周的文化魅力——

青铜器是“一部活生生的史书”

■本报记者 许珂

刘洁（资料图）

船山故里国学飘香 石鼓书院大讲坛·国学讲座

夏、商、周三个朝代，前后有1800多年历史。史学家经常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三个朝代有个共同的特点——分封制和宗法制、奴隶制社会和青铜器时代。其中，发达的青铜器是夏商周最显著的文化特点。

近日，专栏作家、留日学者刘洁做客国学讲座，除了向大家讲述青铜器的质地、工艺、造型、纹饰、铭文等方面的知识之外，还为大家描绘了汉字之源头、艺术之瑰宝甲骨文，让大家懂得了青铜器、甲骨文在夏商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青铜器代表着三代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多为礼仪用具、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所以，夏商周在史学上被称为“青铜时代”。这其中，青铜器与古代礼制的关系尤为凸显。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就曾指出：“全世界古代许多地方有青铜时代，但只有中国三代的青铜器在支持政治力量上有这种独特的形式。”

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古代青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特点。礼器的发达是由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异常强大的“宗法血缘”关系决定的。人们对祖先、对神灵的崇拜远远超越了对于自身的认同。

追溯起青铜器的源头，夏代已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十分发展成熟，主要的器类都已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利的标志。《史记——封禅书》记载：“(夏)禹收九牧之金(铜)铸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后来，“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今洛阳)。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了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元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

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i 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该鼎形体巨大，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商和西周是青铜器的鼎盛期。商周时期，青铜器除了作为国家重要的祭祀礼器之外，还有“铭贵贱，别等列”的功能，天子、诸侯、卿大夫，身份不同，使用青铜礼器的形制和件数有严格的规定，不可逾越。自西周起，鼎则成为主要的身份标志，形成所谓“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的用鼎制度。古代文献中也有“禹铸九鼎”的记载，即用鼎象征天下九州，代表王权，可见青铜器的地位之高。

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

甲骨文给中国文化添上动人的一笔

甲骨文是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一带，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有3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研究我国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统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甲骨文书法重要的财富。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构字体上看，文字不仅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还显示了稳定的格局。因此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从用笔上看，甲骨文因用刀契刻在坚硬的龟甲或兽骨上，所以，刻时多用直线，曲线也是由短的直线接刻而成。其笔画粗细也多是均匀；由于起刀和收刀直落直起，故多数线条呈现出中间稍粗两端略细的特征，显得瘦劲坚实，挺拔爽利，并且富有立体感。

就结字而言，甲骨文外形并且多以长方形为主间或少数方形，具备了对称美或者一字多形的变化美。而且甲骨文在结字上还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辑让的结构形式，有的字还具有或多或少的象形图画的痕迹，具有文字最初发展阶段的稚拙和生动。

从章法上看，卜辞全篇行款清晰，文字大小错落有致。每行上下、左右、虽有疏密变化，但全篇能行气贯串、大小相依、左右相应、前后呼应的活泼局面。并且，字数多者，全篇安排紧凑，给人以茂密之感，字数少者又显得疏朗空灵，总之，都呈现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

商朝的人大都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关于天气，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早生贵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其内容可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王共约273年，经历8世12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也有早晚先后之分。如今主要采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雄伟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第二期(谨饬期)：祖庚、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谨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第三期：廪辛、康丁(颓靡期)，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第四期：武乙、文丁(劲峭期)，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第五期(严整期)：帝乙、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截至2014年10月，我国已发现大约13万片甲骨，4000多个单字。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20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国学教育

宋词与中华情

诗歌经过盛、中、晚唐的充分开掘后，创作愈来愈呈现出程式化的特点。当此之际，“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词”迅速崛起，它沿着晚唐诗坛巨擘李商隐重主观、重心灵世界、重表达纤细情感的创作思路，以“长短句”的新形式，再一次为中国古典文学开疆拓土。王国维先生所谓“词者之真”，便是肯定宋词对心灵与情感世界前所未有的开拓与表现。那些细美幽约、辞短情长的句子，千载之下仍令无数读者为之倾倒与动容。

宋词中的亲情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宋词对此多有表现。试观《沁园春·孤馆灯青》下阙云：“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据小序，该词系苏轼“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苏辙)”，当时兄弟二人已七年未见。苏轼先是深情回忆了嘉祐年间与弟弟初至汴京的情景，“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以西晋文坛陆机、陆云兄弟自况，“胸中万卷”化用杜甫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同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意。凡此种种，何等意气风发。然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便是苏轼历尽世事沧桑、宦海沉浮后的甘苦之言，如此推心置腹之语也唯有与胞弟倾诉。末句“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同其《洗儿》“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之意，东坡不愿至亲之人再为世俗的标准所羁绊，而仅以身体康健、优游容与相期。短短58字，包含三层意思，却又无不指向手足深情。

同样写手足情而被誉为千古佳构的还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下阙云：“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该词作于苏轼密州知州任上，时值中秋佳节，皓月当空，词人与胞弟苏辙却无缘得见，只能通过饮酒填词抒发思念之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以极平淡之语道出千古共通之理，余韵悠长。末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突破时间的局限与空间的阻隔，让一轮皓月把“各在天一涯”的亲人连结起来。此时，它已不再是简单指代特定个体间的情愫，而是月映万川，化作对天下离人的共同祝愿。时至今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仍为全球华人所广泛传诵。

如果说前两首词作都是讲血浓于水的思念，那么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则主要着眼于亲人相处的日常。“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短短数语，一个温馨的五口之家跃然纸上，老夫妇阅尽世事而感情弥笃，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着，大儿子在溪边田地劳作，二儿子编织新的鸡笼，最小的孩子卧在小溪边上剥莲蓬吃。安宁的田园，和谐的家庭，平静的画面，这正是最普遍却也最珍贵的天伦乐趣与人间滋味。

宋词中的友情

友情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情感。自许“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柳永为人狂简，“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每逢夜深人静，他也会轻吟“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感慨“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看来，往昔与朋友共度的时光是柳永心中不多的美好回忆之一。“太平宰相”晏殊词作雍容，多写闲雅情调与旷达怀抱，然一涉友人远行，则云“画阁魂消，高楼目断，斜阳只送平波远。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词人毫不掩饰友人离去后的怅惘与孤独，他那无尽的思念超越了时空的界限，誓将陪伴好友行遍天涯海角。“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苏轼一生多苦难而少欢愉，困顿之中，他愈加感受到友情的珍贵。试观其《南乡子·送述古》云：“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与陈述古共事两年有余，感情深厚，后陈述古调赴南都，苏轼作此词相送。上阕“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山塔不过词人移情之物，意在点出作者曾亲迎述古、如今复为之饯行的事实，流露出光阴易逝、倏聚忽散之感；另一方面，山塔亭亭耸立，迎来送往，然终为无情之物，不解人世变迁，以此更衬托出词人送别友人的感伤。下阕佳处在以秋寒写友人离去后的凄清，衬托出词人内心的孤寂。末句“秋雨晴时泪不晴”更是妙生笔端，以对比手法突出了作者对友人的深情。

宋词中的爱情

宋词是“爱情文学”的百花园。“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词人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新妇的音容笑貌，“前段态，后段情”，这是诗词里难得一见的婚后生活画面；“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这是望眼欲穿的期盼；“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这是刻骨铭心的思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这是此生不换的坚守；“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这是势要冲破现实阻挠的炽热。“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柳永揭示了爱情里的无奈；“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浅吟着爱情中的怅惘；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更是向世人展示了何谓矢志不渝的梦魂相守：“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首《江城子》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概括出某种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即刻骨铭心的相思、痛摧肝肠的离别与生死不渝的忠贞。苏轼在词中“不完全是即兴式的有感而发，而是从原发的情感状态中超越出来”，把他对妻子的思念作为一个对象来重新认识。正是这种“平静的回忆”的介入，使词人的情感得以构造与重塑，从而达到了自我与社会的统一，从“小我”的情感走向人类“大我”。因此，《江城子》既是个性情感的自然流露，又同时表现了人类情感的本质。

宋词中的家国情

宋词中的家国情更是令人动容。安土重迁，古今所同，羁旅倦客晏几道听杜鹃啼鸣，恍惚间觉“声声只道不如归”，惟惜“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人行千里，不忘根本，周邦彦处人生上升期，意气风发，犹云“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眷怀乡土之外，还有对祖国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由衷赞叹。试观潘阆《酒泉子》云：“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钱塘江大潮的盛况如在目前。复观柳永《望海潮》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词人以鸟瞰式的全景构图法，为我们徐徐展开一幅北宋王朝上升期的宏伟历史画卷。举凡“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参差十万人家”“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骑拥高牙”等句，或虚指，或实写，然无不字句铿锵、纵横捭阖，“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前人推许此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允为不刊之论。《望海潮》中国泰民安的盛世气象从此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美好映象，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昌盛砥砺奋进。

宋词之所以能成为词体的最高典范，原因之一就是它进一步深入心灵与情感世界，传达出异彩纷呈的人生体验和心理感受。每一首传唱至今的宋词佳构都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历的亲情、友情、爱情、家国情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共鸣。借用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话来说，宋词“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它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衡阳历史文化 小辞典·人物系列(35)

杨健：

大干实事 关心老百姓疾苦

杨健（1764年—1843年），字鳣堂，号刚亭，清湖南衡州府城（今衡阳市珠晖区）人。杨健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二十五岁入县学，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举人，嘉庆元年（1796年）中举人，嘉庆元年（1796年）考取进士。历任户部主事、乡试副考官、监察御史、知府、布政使、巡抚等职。旧居原名蔬香别墅，后为杨氏家庙，今名退省庵。

杨健在地方上为官不讲排场，大干实事，关心老百姓疾苦。嘉庆十七年（1812年），杨健任广东廉州知府时，见府署巡船开支较大，派费扰民，即将巡船撤销，减轻人民负担。任山东布政使时组织修河堤300余里，使人民免受水患之苦。道光七年（1827年），杨健任湖北巡抚，当时湖北水灾、旱灾频发，连年粮食歉收，老百姓的生活很困苦。杨健遂与湖广总督嵩孚会疏请赈，并贷款修堤，严督各道府限期整修境内堤堰。汉川县地势低洼，每次发洪水，田地房屋都会被淹没。杨健勘查地势，先开凿草桥口，以倾泻横湖水，又开凿消涡泾以通襄水，使两万亩良田无损，而所毁田不过数十亩。钟祥县柴坝工程最大，杨健带头捐银千两，为众人倡导，使之按期竣工。钟祥民众为了感谢他，将堤命名为“杨公堤”。

杨健因两次遭诬陷，道光十年（1830年），被降职回家，从此闭门谢客，但对地方公益事业仍是积极倡导，耿直进言。一次，湖广总督林则徐来衡阳查办盐务，拟严惩盐贩。杨健进言，林则徐采纳了杨健的意见，对此事不予追究。劳苦盐贩，得以保全，也缓解了衡阳民众淡食之苦。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杨健在其衡阳市江东岸的寓所病逝，终年七十九岁。

(记者翟瑜根据市志办提供的资料整理)

用典释义

居官以廉洁为要

居官以廉洁为要。清、慎、勤三者而外，惟俭可以成之。贪墨之吏，费用不赀，好为苛暴，势所必至。故必严以律己，宽以绳人，省滥用之财，自然饶裕；积方便之德，自尔安康。廉能著于当官，福泽流于子孙，不亦休乎。

——《贻清堂·家训》(清·李拔)

■译文

为官廉洁最为关键。除了做到清、慎、勤三点外，还要保持俭朴习惯，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洁。而贪腐的官员，为聚敛钱财，往往不择手段，横征暴敛，势所必然。所以为官者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平常生活要节省，不要滥用财物，生活自然就富裕有余；积累仁政善行，自然身体安康。为官时能做到清正廉洁，幸福与恩惠就会荫及子孙后代，这不是美好的事吗？

■解读

本段选自清代循吏李拔所著的《贻清堂·家训》，作者教育族中子侄，当官清正廉洁最重要，除了要做到清、慎、勤三点外，也只有俭可以达到清正廉洁的完善境界。这里突出“俭”字，指出为官要严守俭德，可谓切中要领。

中国古代先贤常以家训之独特方式，把做人与当官的道理传给子孙，并以家规督导子孙严守家训，以此培养国家可用之才。宋代名儒真德秀教导后人说：“俭者廉本，廉者行先。”俭朴是廉洁的根本，廉洁应是为人的品行之先。因此，那些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不给子孙留多余的资产，以免助长他们的享乐之念、贪欲之心。司马光曾说：“多藏以遗子孙者，吾见其愚之甚。”为何留财产给子孙是愚蠢的做法？林则徐给出了答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无论子孙贤愚与否，留金银之财给他们都是不明智的做法。这些古代先贤，都把“俭”视为当官与做人的品质传给子孙。这既是为官要言，又是做人真谛，对当今的党员领导干部亦有启迪、借鉴的意义。

(据新华网)

成语故事

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写文章用词精练而意含褒贬的写作手法。

语出《史记》：“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孔子修《春秋》，后人认为他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来将其称为“春秋笔法”。

本报综合